

学习词典 与二语教学研究

Learner's Lexicography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主编 章宜华

学习词典与二语教学研究

Learner's Lexicography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第一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exicography and L2 Teaching and Learning

主编 章宜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习词典与二语教学研究 / 章宜华主编.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ISBN 978 - 7 - 5446 - 2030 - 7

I. ①学… II. ①章… III. ①第二语言－语言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0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707 号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张春明

印 刷：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16.5 **字 数：**452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46-2030-7 / H · 0876

定 价：5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前　　言

第一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于 2008 年 11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承办,商务印书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协办。本届会议共收到论文 103 篇,参加会议的代表共计 130 余人,分别来自中国大陆、英国、丹麦、日本、西班牙、波兰、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出版社及科研机构。

本届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主任章宜华教授主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隋广军教授致欢迎辞,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教授、教育部语信司副司长王铁琨教授和章宜华教授先后致贺词。李宇明在致辞中说,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呼吁有关专家学者在词典编纂过程中遵守国家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他强调,词典是构成语言文字规范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词典学在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中,要秉持“把语言看做资源”的理念,着重解决“当前遇到的语言矛盾”,做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信息化和标准化。王铁琨在致辞中表示,由于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此类型的研讨会,教育部对大会的召开予以特别的重视和支持。他同时指出,我国辞书界长期与国际辞书界缺乏联系,我国辞书理论界与辞书编纂、辞书出版界缺乏有效的沟通,我国辞书已不能满足目前需求等问题,

并表明“此次会议是解决问题的好的途径,也为中外专家学者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平台”。王铁琨表示,他愿意利用所掌握的资源为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帮助,并“希望此类国际研讨会能够一届届办下去,办出特点,办出成效。”

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章宜华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宗旨在于促进国内外词典学家、辞书出版社和二语教学人员的国际交流,为我国辞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走向世界开辟道路。”他指出,近年来,第二语言的学习热直接推动了学习型词典的研究和编纂。但我国辞书界与国际辞书界长期缺乏联系,导致现在外国人编写的外语学习词典对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缺乏针对性,而我国出版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未能体现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认知特点。章宜华说:“对于这些现象的存在,希望专家学者们去面对、去反思,集思广益来解决这些问题。”

出席本届国际研讨会的国际词典学专家较多,包括英国著名词典学家 Michael Rundell、丹麦 Aarhus 大学的 Sandro Nielsen、波兰 Adam Mickiewicz 大学的 Robert Lew、日本东京大学的 Yukio Tono、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Vincent B Y Ooi、西班牙 Valladolid 大学的 Pedro A. Fuertes-Olivera 等。这些专家的学术建树颇丰,在其国内和国际上都有一定的影响。

此次会议采用主题发言、专题发言和小组讨论三种形式进行学术交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会学术交流气氛热烈而又和谐,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形式,以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的学术眼光,为词典学与二语教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观点。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教授做了题为“信息化对辞书的重大影响”的主题报告。他从辞书编纂与信息技术、辞书的知识与多媒体方式、因特网与辞书的发展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他指出,辞书界要研究网络运行特点,预测辞书发展方向,唯陈务去,唯新务兴,为中国的辞书事业乃至人类的辞书事业作出贡献。在“语言实态考察研究及相关思考”的主题报告中,王铁琨教授

从汉字、词语、网络语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材、年度流行语和年度新词语等方面,介绍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已经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基本架构、主要数据,并对数据作了详细的解读,提出了对考察研究工作的思考和认识。这些语言生活实态的数据对于我们词典研究和编纂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章宜华教授作了题为“关于新一代学习词典意义驱动多维释义的理论构想”的主题报告,他以认知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理论为基础,深入探讨了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基于二语习得视角的新一代学习词典意义驱动多维释义的理论构想。他指出,新一代学习词典应该变语法驱动为意义驱动,变词汇描述为中心为词汇—语块描述为中心,变孤立的注释为语义和词汇关系网络的呈现;把意义驱动下的话语交际模式和交际方法作为词典释义的重点。此外,学习词典必须考虑学习者用户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一种语言学习词典无法面向和满足所有国家二语学习者的需要,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为不同国家的二语习得者编纂不同的学习词典。章宜华指出,基于语料库的学习词典比较重视二语习得认知发展路径中的“惯用语(formula)”与“低域模式(low-scope pattern)”,而对第三个阶段的“构式(construction)”重视不够,新一代学习词典要突破这些局限,加强对构式的描写。词典解释和呈现的对象要从“基本材料型”向“模块型”转化,从孤立的词汇描写向基于框架的语义描写转化,从语词的个别语义关联描写向网络系统关联描写转化。这种理念符合人类语言认知和学习的规律,对新一代学习词典的编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

在随后的主题报告中,Michael Rundell 的“语料库词典学发展的下一步——语料库数据在学习词典中的显性应用”阐释了学习者语料库在词典编纂中的新应用和使用方法。Yukio Tono 的“学习者语料库:下一代教学词典的基础”展现了学习者语料库的特点及其在下一代教学词典中的应用。Vincent Ooi 的“学习词典中各种英语变体的协调”指出,鉴于英语多中心的特点,在学习词典中应该协调各种英语变体,使亚洲和西方的英语变体能够在词典中得到均

衡的呈现。郑定欧的“谈汉英双语学习词典多义动词的翻译”从词汇—语法的角度探讨了多义动词在双语学习词典中的呈现方法。

在专题报告中,陈国华对英汉搭配所表现的认知和文化差异、Robert Lew 对电子词典表义的新方法、Pedro Fuertes-Olivera 对一体化世界的词典与专门用途英语词典、Sandro Nielsen 对学习词典学到底指什么等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受到了与会代表的欢迎。小组发言分为四个组,先后有 60 余位国内外学者在小组会议上宣读了论文,他们围绕“学习词典与二语教学研究、学习词典编纂研究、语言学理论与学习词典研究、翻译与双语词典研究、电子词典与基于语料库的词典学研究和(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会议的闭幕式一反以前的总结发言形式,让学者们分别就“新一代学习词典应该是什么样子”、“语料库有多大作用”、“印刷版词典与电子词典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这三个焦点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讨论,各抒己见。

这次会议规模大且组织严密,与会人员学术热情高,会上热烈讨论,会下抓紧切磋,取得了很好的学术交流效果。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书展,商务印书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卡西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牛津大学出版社、培生教育出版集团、以色列 Password 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展出了其最新的图书和辞书。这次会议促进了国内外词典学家、辞书出版社和二语教学人员的国际交流,使国内辞书界和二语教育界的学者进一步了解了国外学习词典研究和编纂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也使国外词典学者和出版机构加深了对中国学习者对外语词典的需求的了解。同时,国外汉语教育和出版机构也更多地了解了我国汉语和对外汉语词典的研究和出版情况,这些都为我国辞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走向世界作了有益的探索。

本次会议以大会发言、专题发言和小组讨论三种形式宣读的论文有 70 余篇、近 80 万字,而论文集只能容纳 30 余万字,因此有一大半论文无法收录;我们只能从会议主题内容上把握,多次组织专家

会议进行遴选，很多好的论文不得不因篇幅限制而割爱了。另外，会议论文的来源比较复杂，行文格式、注释格式和参考文献的格式比较混乱，有些夹注和文献注释资料不全，返回修改也未解决问题，最后只有我们在网上查找相关来源资料，逐条修改；由于编辑人力紧张，为此耗了很多时间。请大家谅解。

本次会议还得到卡西欧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对会议提供的赞助。会议论文集的编辑与出版得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广外词典学研究中心马志刚和李茜博士也对论文集的审校提供了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学习词典与二语教学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9年11月

信息化对辞书的重大影响(代序一)

国家语委、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李宇明

辞书是特殊的读物。一般读物供人系统阅读,但辞书的主要功能是“备查”。要发挥备查功能,就不仅要有备查内容,还要提供对内容的检索途径;内容系统和检索系统,构成辞书的两个基础系统。供人系统阅读的一般读物,重视内容系统,检索系统则较为简略,多是通过目录发挥检索作用,顶多再在书后附上术语索引、人名索引之类,这显然与辞书有别。

一部辞书发展史,可以说就是围绕着处理检索系统和内容系统逐步展开的。过去,书斋(包括图书馆、教室、办公室)是信息的主要扩散源,纸质辞书置于书斋,便基本可以满足文化精英的查阅需求。但是当人类进入因特网时代之后,辞书的查阅需求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同时信息技术也为辞书的发展提供了划时代的机遇。研究信息技术对辞书已经带来的和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是促进辞书事业发展的必备之课。

本文探讨信息技术对辞书检索和辞书内容这两个基本系统所产生的影响,展望因特网对辞书发展的意义,以唤起辞书界对信息技术的高度关注,加快辞书业的信息化步伐。

1. 信息技术带来极大的检索便利

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使辞书形态发生根本改变,赋予辞书前所未有的检索功能,从而可使辞书常在手头,辞书检索近乎随心所欲。

1.1 辞书常在手头

信息技术对辞书发展最为直观的影响,是能够使辞书常在手头,不必时时回到书斋里去查阅。信息技术与辞书结合,产生了电子辞书这种新的辞书样式。电子辞书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形成光盘辞书、袖珍电子辞书(即微型芯片电子辞书,俗称“掌上电子词典”)和网络辞书(Online Dictionary)等具有多种类别的电子辞书家族。电子辞书家族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比纸质辞书携带方便。光盘辞书和袖珍电子辞书,比纸质辞书体积小,重量轻,携带起来异常方便。电子辞书还可以用软件或硬件的方式嵌入到其他电器中,随时待用。网络辞书,根本就不需要携带,只要上网即可查询。特别是手机联网技术的发展,手机成为因特网的重要终端,因特网具有移动性和随身性,人们可以把电子辞书装进手机,也可以利用手机随时随地查询网络辞书。信息技术可以做到“辞书常在手头”。

1.2 检索随心所欲

信息技术可为电子辞书提供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检索功能。就检索方式来说,可以通过键盘、手写、触屏、语音等进行检索;就检索使用的语言单位来说,可以利用字、词语、句子等不同级别的语言单位进行检索;就检索项目的多寡来说,可以进行单一检索和复合检索;就检索精度来说,可以进行精确检索和模糊检索。理论上讲,电子辞书可以用人们能够想到的任何方式进行检索。

纸质辞书的检索技术,自古至今也在不断发展,但怎么发展都是有限的。拼音文字的纸质辞书,多用字母顺序进行检索。汉语的纸质辞书,现在常见的有音序检索和字形检索,字形检索可以通过部首、笔画等方式进行,也可以采用其他编码方式(如四角号码)进行。这些检索方式与电子辞书的检索方式,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不同的人由于接受教育的不同,使用辞书的经历不同,常常形成不同的辞书检索习惯。电子辞书已有的和可能发展起来的丰富多彩的检索方式,可以适应不同人的检索习惯,可以满足不同的检索需求,可以提高检索的效率和精准度,使检索达到“随心所欲”。

辞书常在手头,检索随心所欲,这是辞书检索的理想状态,信息

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一理想。

2. 辞书就是人类的知识库

仔细推敲起来,辞书编纂者的工作就是把握民族语感^①、梳理人类知识。民族语感细腻微妙,人类知识博大精深,以卡片为主要工作手段的辞书编纂者,纵是有历史的丰厚积累和个人的丰富经验,有编纂团队相互之间巧妙的分工合作,但要把民族语感准确地物化进辞书,把人类的知识科学地编织进辞书,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在这些方面切实有效地帮助编纂者,有望使辞书质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2.1 三大法宝

信息技术可以为辞书编纂者提供“三大法宝”。法宝之一是功能强大的知识库。编纂者借助知识库可以大大提高梳理人类知识的能力,编辑能量能够得到超常发挥,从而使辞书的条目更丰富,条目和义项的排列更合理,释义更精准。

法宝之二是足以体现民族语感的语料库。编纂者借助语料库可以更好地把握民族语感,从而保障条目及条目的义项更为理想,释义语言和例句选择更为贴切。

法宝之三是系列的“助编软件”。编纂者在这套软件的帮助下,可以使辞书的编写体例更加规范一致,编纂更快捷,修订更方便。

信息技术为编纂者提供的这三大法宝,可以显著提高辞书的内容质量。

2.2 多媒体的功力

传统辞书基本上是单媒体的,即使在文字中加上一些插图、照片,那也是辅助性质的、静态的。信息技术可以采用多媒体的方式呈现辞书内容。多媒体的最大贡献,是使辞书的不同内容找到最适宜的表现方式。用文字表现最适宜的就用文字;描摹声音的,如天

^① 双语词典和多语词典,还要把握两种或多种民族语言的语感。

籁之声、禽兽鸟虫的鸣叫、语音、音乐等,可以用音频;描写事物、事件的可以用图示、照片、摄像等视频。多媒体使辞书由静态变为动态,使辞书更加逼真生动,同时也减少了只用文字释义的笨拙。

多媒体不仅使辞书的“释义”、“举例”获得了超文本的巨大进展,而且由于使辞书具有可读、可听、可视的功能,也就拓宽了辞书的使用空间,扩大了使用辞书的人群。人们在从事其他活动时,比如开车、做饭的时候,也有可能使用辞书;盲人、聋人、手指病残者,也有可能利用健康人的辞书使用,比如盲人和手指病残者可以通过声音检索辞书,聋人和手指病残者可以通过视频或文字查阅辞书。

2.3 及时更新

辞书的内容有些可以长时不变,有些则需要及时更新,比如新产生的词语、词语的新义项新用法,出现的新事物、新事态、新观念,等等,辞书就需要及时反映。纸质辞书更新周期漫长,更新成本昂贵,信息技术则为辞书更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首先是辞书编纂者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及其产品,及时把握各种新情况。不断更新的功能强大的知识库,能够帮助辞书编纂者不断更新知识,及时了解各种新事物、新事态和新观念,择其善者而入典;不断更新的各种语料库,能够帮助辞书编纂者及时捕捉各种新的语言现象,选其妥者而入书。

辞书编纂者及时把握各种新情况,辞书内容的及时更新便有了可能性。而信息技术可以使辞书的改版升级变得十分便捷,更新成本远低于纸质辞书。特别是网络辞书,其更新操作就是用新文本替换旧文本,用户更新的成本就是信息下载的成本,更为低廉。信息技术使辞书的及时更新有了可能性和可行性,辞书内容陈旧的问题可望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得到根本解决。

2.4 超级集成

由于信息技术为电子辞书提供了强大的检索功能,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以及辞书的容量基本上成为不需考虑的因素,现代辞书可以将所有的工具书汇聚起来,实现超级集成。例如微软公司的Bookshelf(2000年版),整合了《美国传统词典》(第三版)、《微软出

版社计算机与互联网词典》、《原创罗杰英语词汇和短语分类词典》、《Encarta 案头百科全书》、《哥伦比亚引语词典》、《Encarta 世界地图集》、《Encarta 2000 新世界年鉴》、《Encarta 2000 世界时间长廊》、《Encarta 文体及其应用手册》等多媒体的工具书,而且还有“网络连接”,这显然已经是座微型图书馆了。^①

微软公司的 Bookshelf 是信息时代辞书的雏形。理论上说,信息技术可以将人类的所有文献积聚起来。辞书的大整合大集成,理论上说就会变成人类的大知识库。如此一来,辞书的功能就会发生革命性变化,不再仅仅是“备查”,而且也会具有阅读学习功能,具有“知识发掘”功能,从而与知识的获取与创造发生了直接关系。在超级集成的条件下,辞书不再仅是贮存已有的知识,还能够创造新知识。

3. 因特网与辞书的发展

因特网是人类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发明,它把人类的知识和智慧网络起来,带来信息快捷而高度的积聚,带来人类知识的快速检索应用,推进人类整体智慧的加速度提升。因特网给予辞书的影响,不仅仅是把辞书放在网上,不仅仅是建立辞书网站,不仅仅是使辞书的使用和更新更为方便,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3.1 网络互动

因特网对辞书发展最具意义的影响,首先应该是“网络互动”。常见的网络互动方式有以下几种:

A) 征求网民意见。辞书编纂者(或是网络内容提供商),出于完善辞书的目的,将编写好的辞书或是词条放在网上,边供网民参考试用,边征求意见。网民可以对辞书或词条进行简要评价,或是提出各种具体建议,也可以进行补充、修正。

B) 组织网民编典。辞书编纂者(或是网络内容提供商),在网

^① 见罗怡(2000)。

络上提出编写意向,让网民提供词条、释义、句例等。然后对收集到的网络成果整理完善,形成辞书。

C) 网上“援答”。网民遇到疑难问题,便到网上求援。网民的求援常能得到其他网民(包括相关专家)的及时回应。这种“援答”结果还常“链条式滚动”,得到不断补充。这样“援答”项目长期保存网上,就变成了网络共享的集体成果。

传统辞书的编写过程中,编纂者也常在一定范围内听取意见,或是回答用户来信,进行编者与用户的互动。但这种互动属于“学术民主”、“读者服务”的范畴,能够增加辞书与用户的联系,但不会影响辞书的固有属性,不涉及编者和用户的身份。

网络互动则不然。它打破了传统辞书的知识运动的单向性,用户(网民)由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变为辞书编纂的参与者,甚至是词条条目的提出者。编者由知识的输出者也兼而成为知识的接受者,接受网民的评价建议,接受网民对内容的补充修改,甚至接受网民提供的条目和条目解释。

这种知识运动方向的变化,可能带来编者和用户身份的变化。在A种互动中,如果网民对辞书补充、修正的内容达到较大比例,辞书或词条的知识产权就可能发生改变,不应为辞书编纂者(或是网络内容提供商)所独有。B、C两种互动方式产生的成果,分不出编者和用户,应该看作网民共创的网络公共产品,为网民共用和共有。在这种公共产品形成的过程中,当然需要辞书编纂者对网络成果及时整理,增加其知识的信度,实现其表述上的规范性。这也许会成为辞书编纂者未来的主要工作。

网络互动的意义,还在于用户(网民)的疑难有望得到及时解决。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靠专家,不仅靠已有的文献成果,而且还可以利用没有表现为文献的网民智慧。及时解决疑难正是辞书的社会功能,也是辞书之所以存在的理据。

3.2 因特网的魅力

网络互动只是因特网的辞书功效之一,因特网的魅力还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巨量知识库。因特网不仅拥有巨量信息,而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会不断增添,无限累积。理论上说,凡是人类拥有的知识,都可以在因特网上寻找得到;凡是常人遇到的问题,都能够利用因特网来解答。这也正是辞书的梦想。因特网存在的问题,是信息繁多芜杂,信息质量不如精心编纂的辞书。怎样有效利用因特网的信息,是未来辞书学家必须思考的事情。

有效利用因特网的信息,首要问题是妥善处理因特网资源的知识产权。其次是辞书编纂者如何利用因特网资源,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粹化,去其芜杂,增加信度。其三是如何将整理粹化的成果,方便地提供给用户(网民)。这些问题如果得到了充分思考和有效解决,辞书(也许将来不用这个名称)便会永远与因特网同步成长。

4. 结语

辞书的发展,一直是要解决“何人查、查什么、何地查、何时查、以何种方式查”等问题,理想的辞书应当达到这样的水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回答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查询的任何问题。网络辞书,特别是因特网的发展与利用,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一辞书理想。

从《尔雅》和《说文解字》的问世算起,中国辞书已经走了两千多年的路程。^① 在信息时代到来的时期,在辞书面临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辞书学界应先知春江水温,尽快逾越传统的编纂、出版阶段,不仅为纸质辞书换上电子服装,而且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库、语料库,开发助编软件;要研究网络运行特点,预测辞书发展方向,唯陈务去,唯新务兴,为中国的辞书事业乃至人类的辞书事业作出贡献。

作于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 35 号
2010 年 4 月

^① 胡奇光、方环海(2004)认为,《尔雅》初稿成于战国末年、秦朝初年。(《前言》第 7 页)

语言实态考察研究及相关思考(代序二)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王铁琨

近几年,中国发生了一件比较引人注目的事情,那就是由国家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开始定期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这既是对语言实态进行考察研究的有益尝试,也是语言文字工作信息公开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引导民众关注语言生活,把握语言国情,冷静客观地看待和应对语言生活中的各种新变化和歧异现象,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采用计算机、语料库和数理统计等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实现了语言使用实态的“大规模”动态监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对语言生活实态的了解“若明若暗”的状况。调查获取的大量数据和第一手材料,为语言学者进行深度分析解读和跟踪研究提供了鲜活、宝贵的资源,也为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的制定、调整和有效实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依据(参看陈章太《语言国情调查研究的重大成果》,戴庆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研究的新篇章》,均载《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1期)。

1. 已发布的主要数据及初步解读

1.1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基本架构

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分上下两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上编的基本内容是“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对年度中国语言生活若干方面的调查报告,包括工作篇(2005年度为“领域篇”)、专题篇、热点篇、港澳台篇和参考篇

五大部分,以及介绍相关内容的附录。下编的基本内容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对年度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语言以及教育教材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统计数据,包括调查报告和数据两大部分,其中2006年度、2007年度的数据侧重于同过往年度数据的对比,用户从中可以形象、直观地看出年度之间语言文字使用的情况及其动态变化。

下面,摘要介绍2005年度、2006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均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编的主要数据,并进行初步解读。其中,也少量使用了刚刚发布的2007年度的一些数据。

1.2 主要数据及对数据的初步解读

1) 汉字使用情况:2005、2006年度汉字的使用总体来说既相对稳定,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些微变化,可以概括为“稳中有变”。2005年度调查了7.32亿字次汉字语料,2006年度调查了9.78亿字次汉字语料,语料规模有所扩大,但是从高频字的统计数量来看,相差并不是很大,表现出稳定性强的特点。2005年度覆盖全部语料80%时是581个汉字,覆盖全部语料90%时是934个汉字,覆盖全部语料99%时是2,314个汉字;而2006年度覆盖全部语料80%、90%、99%时使用的汉字分别为591、958和2377个,其中覆盖语料80%时用的字仅比2005年度多了10个,显然与语料规模的差异有一定关系。在使用频率最高的前600个汉字中,两年相比只有21个字不同,前1000个高频字中只有34个字不同(详见《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下编)第012页,表1—11,商务印书馆,2007年8月第1版。下文所引数据均见此书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下编),恕不一一注明),说明这两个年度汉字的使用总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我们还将调查所得汉字与以往发布的汉字规范进行了比较,发现前2500个高频字中2005年度有357个字、2006年度有331个字是“一级常用字”中所没有的,前3500个高频字中2005年度有398个字、2006年度有388个字是《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所没有的。说明现在的实际用字已经与当年制定常用字表时情况有了很大不同。